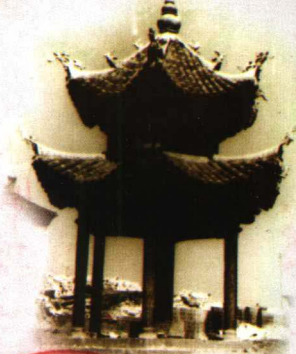


1702

第八集



丹江口文史资料

DIBAJI DANJIANGKOU WENSHI

ZILIAO DANJIANGKOU SHI

ZHENGXIE WENSHI ZILIAO

WEIYUANHUI



丹江口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丹江口文史资料

Danjiangkou Wenshi Ziliao

丹江口文史资料

第八辑

丹江口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二〇〇六年五月

Danjiangkou Wenshi Ziliao
丹江口文史资料 (第八辑)

主 编 / 潘耀合

责任编辑 / 曹仲明

丹江口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

湖北省丹江口市沙陀营路 158 号

电话: 0719—5225196

邮编: 442700

E-mail: cx0078@21cn.com

开 本 / 850 × 1168mm 1 / 32

字 数 / 180 千

印 张 / 10.5

纸 型 / 60 克书刊纸

2006 年 5 月出版

丹江口市迅达印刷厂印刷

DW1 ~ 8ESNTZ (2006) 013 号

目 录

刘 忠	1 南下西进“川干队”
刘毓兰	30 亲历南京那段地下工作
徐永昭	35 武汉党组织恢复时的陈约珥和习东光
佚名	42 抗日根据地出版发行的报刊
万京华	53 抗日根据地的新华分社
魏克明	65 悼念范长江同志
魏明远	69 伯父早期地下活动点滴
胡晓琴	71 魏克明在阳城
王 良	73 我的启蒙老师魏克明
一 丁	77 魏克明三劝赵树理
夏其言 陈念云	83 报坛倾砥柱 人间失良师

冯英子	95	我为斯民哭健儿
蒋星煜	101	忆报坛耆宿魏克明
吉景峰 贾安坤	104	回忆魏克明对我们的教导
陈晓东	107	我的好前辈
吉景峰	111	我们的好顾问
陈 迟	114	不尽的缅怀和忆念
金维新	119	对三张便条的记忆
许 寅	122	悼老魏
方 向	128	难忘的采访源动力
陈念云	130	魏克明谈报纸改革
向 忆	142	《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发表经过
蒋星煜	146	海瑞魏征和我的冤案
楼伊菁	151	《李世民与魏征》的编者按
张 华 甄京波	157	我的家庭与我的风雨人生
黄怡新 王定立	181	琐忆徐向前与黄杰往事
丁力先	186	记忆薛学勤

陈翔宇	190 我的作曲经历
傅忠金	194 我的两次导游经历
沈均奕	211 我了解到的《兰心诗钞》
刘志军	220 熊家庄二里头文化发掘存忆
邓 仙	238 郭欧五给我的印象
王文凯	239 听父亲说见证日军投降
潘耀合	241 忆柳河口人民公社“五·七”大学
熊孟弼	243 闲话艰苦岁月
卢述华	247 习家店武斗事件的前后
赵全富	273 赴日研修见闻
潘耀合	285 我的美国之行
朱道琼	290 武当内家拳功理功法研讨会纪实
傅忠金	295 对均州剧场建设经过的回忆

熊孟弼

305 对均县地名普查工作的回忆

张华鹏

310 草店·小店子·石板滩

南下西进的“川干队”

刘 忠

1947年全国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全面进攻的总趋势已经形成，随着一些城市与地区的解放，党中央开始将工作重点转入解放西南的准备工作。

一 “川干队”的成立及活动

为了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配合大军入川，根据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在中央总的战略部署下，确定于1947年10月组建“四川干部队（以下简称川干队）”，进入原川陕苏区，创建川陕鄂根据地。经过训练之后，在适当时机开赴四川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迎接大军

入川，做好解放四川的准备工作。

“四川干部队”对外的名称为“长江支队”，基本上由三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从重庆、南京、上海撤回来的同志和原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的同志（多数是四川籍）；另一部分是贺龙同志领导的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部所属部队中工作的原四方面军的四川籍老红军；此外还有少数在党中央机关工作和在陕北、晋绥地区工作的四川籍干部。在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和城市工作部的组织下，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等人亲自筹划和抽调人员。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共调集了四百五十余人，于九十月间陆续集中到临县三交镇的义圪垛村。担任支队长的是于江震，为原四川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副队长是《新华日报》的领导干部梁华，为原四川省委常委；政治部主任杨超，为原四川省委委员、社会部长；政治部副主任陈野萍是原《新华日报》总支书记；参谋长程占彪，为原西北五省联防司令部副参谋长、中共四川工委常委。川干队在编制上分为四个大队。一至三大队是主力军，四大队是家属队，每个大队都有百余人。大队下分设三个中队，每个中队又设置三个分队，大队的人数相当于一个连的建制。经支队总部提议，中央城工部批准，四个大队的负责干部分别是：一大队队长梁华（兼），指导员熊复；二大队队长孔勋，指导员陈野萍（兼）；三大队队长龙飞虎，指导员刘瞻；四大队队长石昌杰，副大队长杨继干，指导员王逐萍。

一大批久经考验的党、政、军、财、文各方面的优秀

人才和忠诚战士集合在新的旗帜下，在解放战争的洪流中，正待起锚扬帆，去实现自己光荣而艰巨的使命。

10月21日，川干队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大会。杨尚昆、李维汉、吴玉章、王维舟等领导同志前来参加并讲了话。他们的讲话使全体同志受到极大地鼓舞。当时，随着瞬息万变的时局，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新设想作出了新的决定，将川干队插入敌人心脏，开展游击战。我们的任务是南下到豫西南，进入四川的边界地区，开辟根据地，发展武装力量，形成一个小拳头，与苏浙皖边和湘赣边的另外两支队伍形成的小拳头相互配合，协助大军作战。川干队的活动区域为“北起汉水，南迄长江与万蓬公路，西至嘉陵江，东抵川陕鄂边”，大约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囊括41个县。在这样广阔的空间，我们将根据中央部署，把人民战争更深入地引向敌后，进一步破坏蒋介石的反革命战略，加速其彻底灭亡的命运。

我于1947年10月调入川干队第三大队。在队伍组建初期，我们主要是进行训练、学习。其内容都是根据这支队伍的素质及所要执行的任务精心设计和安排的，目的是为了适应未来艰苦的斗争环境，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做好充分准备。

23日杨尚昆来到川干队，对当时的战争形势和我们的具体任务做了系统的报告。他详细分析了一年多来战局发生的重大变化，明确指出我军已从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反攻，消灭了敌人130万。杨尚昆的讲话坚定了我们必胜的信心，同时对我们所肩负的使命加深了认识。接着，熊

复又传达了周恩来河西的时局报告，从敌我双方的形势、力量对比以及全体人民的觉醒程度与参战的决心，进一步确立了我军必胜的信念。

25日吴玉章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请缨杀敌信。吴老在信中说：“我于前日来三交，参加四川干部队开学典礼，这些干部有些是长征来的，大部分是今年三月由重庆、南京、上海等处被迫撤回来的，以我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节节胜利的形势和大家高涨的情绪来看，大约训练一月后，他们可以起程前进。见同志们革命的热情，时局发展的迅速也异常兴奋，我虽然年已届七十，仍愿请缨杀敌……在西南各省创建新根据地。”11月18日，毛泽东复函说：“来示及意见书，收到读悉，尊体日益强健，热情甚高，极为快慰……向川陕鄂边发展根据地一事，业已有所部署。”由此可以看出，组建四川干部队，进入原川陕苏区开创川陕鄂根据地，是党中央对于开展全面大反攻中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

除了叶剑英、吴老、杨尚昆等人在川干队成立大会上先后做过重要报告外，我还特别记得陈毅从前线回到陕北参加中央十二月会议，途中经过三交镇，也特意到川干队看望同志们，给我们讲述了华东战场的形势，讲了孟良崮战役痛歼蒋介石王牌七十四师的详细经过。他且热情洋溢地鼓励大家说：“我也是四川人，离开家乡二十多年了，我也很想回到家乡去，你们比我先回去，我祝贺你们成功！我只有等全国胜利后，看毛主席准不准假，才能回去啰！他的一番话说得大家无不为之感动。那时，我们每

一个人的最大心愿几乎都是共同一致的。

10月底11月初的样子，全队转入《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学习。这个大纲是我党根据1947年9月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制定的。陈野萍参加了全国土地会议，由他向全队同志传达了刘少奇在大会所作的报告结论部分，就此提出了“六新”的要求：即“新形势、新政策、新任务、新作风、新组织、新人物”。叶剑英于11月中旬给我们做了关于土地会议的报告并就土改的一些具体问题，即新区的各项政策，做了详尽的阐述。我们从中清楚地认识到团结和组织广大的农民，进行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保证战争最后胜利的关键。

学习共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的学习主要是以中央领导干部的讲话以及新区的政策为主。学习的方式是读文件、听报告与讨论相结合。毛泽东的一篇著名文章《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即是我第一次在那时看到。当时学过的文件还有《井冈山的斗争》、《福建两面政权》、《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国土地法大纲》和解放军总部重新颁布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等。除此之外，还安排了一些军事训练，曾请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长李涛给我们讲授游击战争战术。

第二阶段的学习是从12月初开始的以“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内容的整党运动，这也是我所经历的党内一次较大的运动。方法是通过学习文件、总结工作，自

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提高思想、严密组织、鼓舞斗志、增强信心的目的。这次的整党运动，是在大反攻即将来临，夺取全国胜利的关键时刻，由刘少奇、朱德主持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在西柏坡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上提出来的。川干队根据城工部的部署，结合自身特点，由政治学习转入整党运动。按照整党运动的要求，主要是在党内肃清地主、富农思想，从选举总支的活动拉开序幕。首先从支队和大队两级领导开始入手，进行批评、自我批评与民主评议。此后便是以中队为单位，学习文件，对照检查。由于当时解放区在土改和农村整党中都普遍存在“左”的偏向，这使我们在这次运动中受到了影响。例如，不恰当地划分阶级成分，让出身不好的同志“过关”，工农出身的“把关”，错误地要求知识分子“缴枪”等，给许多同志造成压力，特别是剥削阶级出身的同志。记得当时召开全体会的时候，对四个大队的人员进行站队。有位领导在台上讲话说：“地富出身的人要给贫下中农出身的人做儿子”并指示站队时要打乱队的建制，按出身排列，地富出身的站一起，贫下中农出身的站一起。这样的做法使同志们的关系弥漫着剑拔弩张的气氛。由于我不是贫下中农出身，又一向被别人看作是知识分子，所以在排队时，便让我站在地富出身的那一队，令我心惊胆颤。可我内心坦然并不害怕，因为我不是地富出身，历史上又没有问题。运动开始后，有的大队集中批判几个人，时间较长，将其围在当中，不让坐下。有的同志头天还很活跃，第二天就垂头丧气，关系搞得很紧张。运

动开始不久，党中央很快就发现这样不妥并纠正了这种“左”的偏向。我们及时学习了毛主席刚发表的《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一文，拨正了学习的方向，总结了整党的工作，将运动扭转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以思想教育为主”的正确轨道上，从而使全体同志又经受了一次深刻的党性锻炼。

川干队的集训，原计划一个半月，实际经历了四个月时间。这项学习大家普遍感到收效甚大，政治上更加成熟和坚定了。在我的周围，一大批过去战斗在敌人虎口下的新闻战士和报丁、报童曾因在国统区停止发展党员而未解决组织问题的，都在集训学习和这次整党中被接收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党的组织在川干队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壮大。

二 南下途中

1948年2月集训结束，20日，川干队举行了南下誓师大会。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等人亲临参加。叶剑英代表中央军委授予我们由他书写的“长江支队”四个遒劲大字的军旗一面，参谋长程占彪代表支队接旗并表决心。第二天，正当北国还是千里冰封、大雪纷飞之时，我们全体队员在意气风发的战歌声中，迈开铿锵的步伐，踏上南下的征程。难忘的是，临行时，义圪垛村群众给我们队伍一面锦旗，上书“发扬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几个醒目大字。陈野萍代表大家表决心，绝不辜负义圪垛“母亲”的临别赠言与愿望。当队伍行至陡泉村时，李维汉已

同周子健等和当地群众等候在道路两旁，这情景正如他在誓师典礼上所说的“十里长亭”相送。李亚群还赋诗赠送：“汉水有声招饮马，巴山翘首待征旗。百年战士心头愿，色变神州看此时。”

我们从三交镇出发，到达第一站是距三交镇 70 里的“大武镇”。当时我们的武器装备不足，发的枪支还不到二分之一，只有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才保证有枪。那是我参加革命队伍以来第一次正式站岗。我站在距同志们宿营地不远的道口，肩背子弹上膛的步枪，虽说经过当天的行军已经十分疲惫，但是此刻却不敢有丝毫的放松。我瞪大双眼，警惕地向周围环视。当时时局动荡，敌人随时有可能出现在我们周围，同志们的安危此时都系于一身，那时确实感到责任重大。北方的早春时节，仍感春寒，特别是夜晚。我只身站立在大武郊外墨色的天空下，眼望寒星闪烁，耳畔夜风索索，望着远近深浅不一的黑色物体轮廓线，浑身上下十分寒冷。那寒冷加之执行任务的责任感，足以将我周身的疲劳暂时驱除殆尽，虽然时间不长就换了岗，但那种体验直到今天却总也忘不掉。

过了大武，脚下的路变得难走起来，一些地方连路都没有。这支队伍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任何困难也没有难倒我们。由于长途行军，道路又崎岖，加上常有些“情况”，所以一路上我们的行李一减再减，尽可能地轻装前进。我的那件背后印有“8”字的《新华日报》篮球队的运动服便是在那一段行军过程中减掉的，这给和平年代的回忆留下了一桩遗憾。我们刚刚从大武撤出，就听说吕锡

山的一个师也经过那里，险些与他们遭遇。

行军途中，常常听说前面有敌人，需要随时做好战斗的准备。队伍行至河南省的“西峡口”时，已经可以听到“隆隆”的炮声，但一时却很难辨清准确方位。我们既不能冒然前进，又不能轻易向后撤退。根据上级的指示，我们只好暂时停了下来等待命令。那时正值青黄不接之时，这样一安营扎寨，吃饭便成了问题。队里的领导临时组织筹粮小组，去搞粮食。那时生活艰苦，体力消耗又大，像我们这样的壮小伙儿一个人一顿就能吃一斤多大米，一个分队十个人每顿煮上十斤米还不够吃。当时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人民的军队与老百姓之间的“鱼水之情”。有时外出寻访的同志找到老百姓家中，遇到没有人时，就将钱和粮票留下，绝不让老百姓吃亏。在长途行军中我们的队伍无论走到哪里，沿途都是给百姓挑水、扫院子，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百姓们也总是要拿出家中最好的食物招待我们，临走时，很多人拉着我们的手，问什么时候再回来，那情景感人极深。

走长途的人，头三四天脚掌和小腿都疼，发肿胀，走路很困难，晚上睡觉脚放高一些，可以减轻疼痛，消肿胀。四天以后就好了，翻山越岭都没问题。

为了沿途做好对群众宣传鼓动工作，保证行军任务的完成，支队还组织了小型文工团。陈野萍任团长，曾德林任副团长，周怀瑾任协理员，团员达36人。其中有《新华日报》的记者、报童，他们演唱了在国统区为群众喜爱的《古怪歌》、《王大娘补缸》等曲目；还有来自延安的

老红军战士，他们演唱了大家熟悉的《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红布条》等陕北民歌和歌剧。文工团最好的演员是顾页和何立业。他们演什么像什么，很受群众欢迎。我也曾表演过“胸中破石”，是特邀郑文用铁锤打的。行军中条件很差，没有幕布，大家就把自己盖被的布单拆下来使用；没有油彩，就以烟墨代替；没有舞台就在草坪上演出。团员们白天行军，晚上排练或演出，有时还要写标语，教育群众，虽然紧张、辛苦，但革命的热情是高涨的，集体是欢乐的、团结的。

除了文工团在宿营地演出外，宣传员还要沿途写标语，贴标语。队伍边走路边唱革命歌曲，最有名的是八路军军歌。三大队一唱完，就齐声高喊：“一大队来一个”，如此循环往复，歌声不断，欢天喜地。有时还唱我们自编的进行曲：“背起背包扛起枪，挺起胸膛上前方。不拉距离不掉队，阶级友爱要发扬。互相督促互相帮忙，团结友爱牢记在心上。”这些革命歌曲，振奋人心，鼓舞斗志，所以环境条件再艰苦，同志们的情绪是乐观的，斗志是昂扬的，至今回忆起当年往事来，还使人感慨万千。

我们的部队在“西峡口”待命期间，还曾打开了县里的一个军火库，补充了一些武器装备。当我们得到通知可以去选择武器时，同志们都异常高兴。我赶到那里时，枪已经没有了，于是我挑了一把马刀，拿在手里比划着，掂量着，兴致勃勃地欣赏了一番，便将它佩挂在腰间，这样走起路来也感到似乎神气了不少，这把刀一直跟随了我很多年。